



株洲风物



状元洲上好风光



醴泉浸月

想像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:皓月当空,寂清如许。一泓清冽的涌泉,在月亮的映照中,静谧而又神秘。这美景正应了一位诗人的浪漫想像:

天上一个月亮,水中一个月亮。天上的月亮在水中,水中的月亮在天上。

这正是醴陵著名的八景之一,“醴泉浸月”的生动写照。在这里,一个“浸”字活托出月的皎洁与泉的甜美,也体现出具有中国独特人文景观的水月情怀。如著名的“二泉映月”“三潭映月”。而唯“醴泉浸月”似乎更富有诗意境界与怡情美感。

这又是一个与“醴”字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。醴的本意中,除了酒,算是“甜美的泉水”了。在考证醴陵县名之由来时,历史记载也没有确切的依据。元丰《九域》载:“醴陵有醴泉。”《名胜志》载:“治北有醴,陵下有井,涌泉如醴,因以名县。”以至把醴陵现在所在地取名为“醴泉镇”。但是也有人质疑这“因水名县”说,他们认为古时的县城当在转步下三洲,即“古城”,至今那里还有古城的遗址。先人们怎么会把相隔二十多里外的“醴泉井”作为县名来命名呢?

这也许是醴陵人有着一一种“水情结”的缘故。

醴泉,甘甜之水,谓之“生命之源”。在中国古文化传统哲学中,“水”还被称为“智慧之源”。中国最原始的智慧就诞生于水中。中国智慧认为,万物是由包括水在内的五种物质相生相克而成的,称为“五行”学。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家老子最推崇水,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水的力量,所谓“上善若水”。庄子主张神与水游。孔子则把水当作仁爱的载体。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。”孟子说“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。”人心不善,如水之倒流,是违背本性啊!

水在宗教中还被视作神灵。是以有净水、法水、活水、圣水之说。

水更多的被人们诗意化: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水还是有情感的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水尤其引发人们的乡愁与恋愁。这就是醴陵人为何如此痴情地迷于水的缘故。“醴泉浸月”,又是一个何等甜美而又多么凄迷的诗化境界啊!



执著之“醴”

翻阅县志,有一个不易为人觉察而又不得不令人猜度的现象,便是自古以来,醴陵之名,一直未改过,尽管醴陵的名字难读,又古又难懂,让人劳心费神,但醴字它美好、祥瑞。美好祥瑞的东西,谁愿意舍弃呢?醴陵人又历来执著、倔强好胜,认准的事情要一做到底,醴字虽然难懂,但他人无我有,独一无二。

建安山上的土著,是醴陵人的祖先。建安山旧时为油尖寨,元末因避乱而立寨,所存十八户,仅有田一二亩,以掘草根、拾木叶为食,又累遭战乱,历尽苦难。元明之际,大乱平息,老寨寨人们相约下山,遂将一块铁锅打破,分成十八块,每户执一块为信物,并在山下建一公舍,每年约定日子相聚,必须以锅铁拼凑验证,方能认定为同乡。也许就是这种患难与共、痴心不改的乡土情结,铸就了后来人团结执着的秉性,而这种秉性,被认为是敢担当大事成就大业的要素所在,这种秉性,尤其在政治军事人才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,如宁太一、李立三、左权、陈明仁等。

宁太一“死如嫉恶当为厉,生不逢时甘作殇”。可见其义胆赤心,在“五四”运动时与李达一起英勇就义的唯一一位女性,叫张挢兰,她就是醴陵人。而陈觉与赵云霄烈士的同狱赴难,他们留给后代的血书,足以惊天地、泣鬼神。

醴陵,似乎更象征一种沉甸甸的乡愁,让她的游子们永远怀想,谁也改变不了她,谁也无法割舍她。



陈文绘唐唐社牧《赤壁》

株洲文脉

株洲七旬老人林志庆萌发“三美合一”创意

延请陶艺大师瓷绘唐诗三百首

余意明

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。唐诗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符号,幼年即喜欢诵读唐诗的我70岁的退休企业家林志庆老人,突发奇想,将唐诗、中国传统文化、醴陵釉下彩瓷工艺三者结合起来,延请陶艺家塑造了300件艺术精品,引来一些专家学者的盛赞。

林志庆,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世家。该家族产生过中国茶学界巨擘庄晚芳、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庄重文。庄重文以设立“庄重文文学奖”著名,内地已有170多位作家获此奖项。林志庆幼时随父母从上海定居株洲,深得父母教育熏陶,尤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、国画。

林志庆说:“中国是一个诗词的国度,唐诗三百首是脍炙人口的名篇,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;中国国画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绘画表现形式,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;醴陵釉下五彩瓷也被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一次在醴陵参观,我突发奇想,想把三种艺术融合起来,创作艺术作品。”

林志庆将自己的想法与醴陵陶瓷艺术家陈文深谈。陈文是醴陵红官窑主任工程师、湖南省陶瓷工艺大师,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,师从著名陶艺家罗小聪教授,后深得湖南醴陵釉下五彩名家邓文科、丁华汉大师的指点,其作品充分吸取中国书法绘画之内涵,立意高远,清新雅致,意境空灵,风格独特。他创作的陶瓷作品《长城》《太湖渔韵》为北京中南海水云榭收藏。

陈文表示,林志庆的创意不错,中国人在瓷器上作画由来已久,技术是成熟的,但策划制作如此大规模的艺术品还从来没有过,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。林志庆表示愿意等待。2012年开始,林志庆差不多每周都往醴陵跑,与陈文协商。陈文先要对唐诗反复研读,然后在瓷器上进行绘制。高温烧制艺术瓷,成品比例不低,不少作品经过二次创作、重绘、烧制。6年之后,三百件唐诗绘画瓷终于完工。

此后,林志庆一发而不可收,陆续请陈文制作了瓷绘《宋词一百首》,请湖南工艺美术大师丁雄、李华君制作了瓷绘《二十四节气》《二十四孝》《五十六个民族》《十大名山》等系列作品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yzhy83@163.com

从岂有此「醴」说起

醴陵

一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

刘放年 肖旭日

侯王之陵也难以定论。醴陵还有两个谜团在云里雾里。

首先是说醴陵之名的由来,没有定论。有因水名县说,有因酒名县说,也有说既不因水也不因酒。我在其后引说的因酒名县说,是来自于一位专家的论证,他叫李行之,是原湖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编审。这里暂且不论。

另有一个谜团是县治何时迁今址,也不见文献记载。只有一篇由湖南省博物馆彭青野撰写的《醴陵古城考略》,他依据史书记载及推论是:醴陵初置县于中三洲,“属长沙郡,晋及刘因之。隋唐废。”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。大概在明朝刘宋以前,醴陵县城一直设在中三洲。这是没有疑问的。宋元以来,醴陵县的建制没有什么变异,旧志也无迁城的记载,如果宋元时迁城,旧志是不难将它交代清楚的。唯独在隋代一度废县并入长沙,县治既废,中三洲之故县城亦当废。到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复置县,属潭州。大概在这复置县治的时候,考虑到中三洲地域不广,北面山石壁立,且故城已废,或考虑到城市拓展,才另建县治于现今的醴陵市所在地。初徙县治无城,一直到明代初年才建城。

这也不过是一个推断。醴陵毕竟留给我们太多神秘的东西。这些东西,或因朝代的更迭而割断,或因历史的久远而湮没。

也许,随着人们研究的不断深入,或随着考古探索的新的发现,我们会从尘封的历史中破译出荆楚古邑的密码,给世人一个惊喜。

千古之“醴”

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。据说全国只有两尊,另一尊在台湾。1986年在船湾镇黄岭出土的青陶食器越氏铜鼎,则出自春秋时期。这就是说,醴陵的历史足以称“千古之醴”了。

即便是建县的两千年,也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它恰似一幅绵长的历史画卷,横陈在我们面前,令我们眼花缭乱,观不胜观。然而由于历史的动乱,醴陵留存的历史资料不是很多。醴陵档案馆、图书馆都是文革后才恢复的,留下来的也不过有《同治志》《民国志》等。许多重要的史料还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一些老牌图书馆,我们曾经去了解过,并且花钱从南京图书馆复印回来一些。据说上海还有不少。所以要研究醴陵历史,关键靠史料,但搞到那些史料,还得花很大气力,付出不少的人力财力;尽管这样,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历史的探索,因为那里有一个丰富的文化宝库,有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。

对于醴陵人来说,还有永远也扯不断的缕缕思古幽情。我在外出的时候,常和醴陵人谈醴陵,往往惊奇于他们的记忆和思辨。他们如数家珍般与我们讲述醴陵的过去,慨叹醴陵历史悠久、人杰地灵。1995年市庆十周年时,我和市庆办的同志去广东联络醴陵乡亲;在电梯间,广东省地震局局长何熙乎用普通话与我们交谈。我说:“你会讲醴陵话吗?”他讲出几句醴陵话来还真真是地道的老方言,连我们都不记得了。他才几岁就随父亲远出,但谈起醴陵,谈起醴陵的历史和人物,倒是格外熟悉和亲切。

和北京的老乡谭国兴谈醴陵史,醴陵人,甚至讲醴陵话,我惊奇他简直是个“醴陵通”。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我们一同回顾醴陵历史,说得真真切切,说到动情处,眼神里满是乡恋之情。



也难怪人们读不懂“醴”字,“醴”是个旧体字。史书记载,醴陵之名,实自秦始,而建县当在东汉初,号称“荆楚古邑”。然而秦汉之前,又是什么呢?已无从查考。对史实的考证,还是留给专家们去思考好了。我们还是从文化的角度,跳出历史的框框,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去寻觅它。

仔细揣摩,就是从人们很不经意的错写中,还真把醴陵的“醴”字说出了些本意。《辞海》里对“醴”字下过这样一些定义:醴,(1)甜酒。《荀子·礼论》:“饔尚玄尊,而用酒醴。”(2)甜美的泉水。杨雄《蜀都赋》:“北属昆仑泰极,涌泉醴。”(3)通“醴”,水名。《楚辞·九歌·湘夫人》:“沅有芷兮澧有兰。”当然还有与“礼”相通通假字。所以这个“醴”字几乎是我国同音字之源。人们在不经意的错写中,倒还道出了“醴”字的许多玄妙。比如“醴”通水,“理”与“醴”则有点歪打正着,“理学”,还是醴陵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朱子学说。“礼”与“醴”本是同根生,那么研究醴陵文化,更会有做不完的文章。中国自古是个礼仪之邦,醴陵也不例外。至于对“陵”字的乱造,就当是三岁小孩的童稚之趣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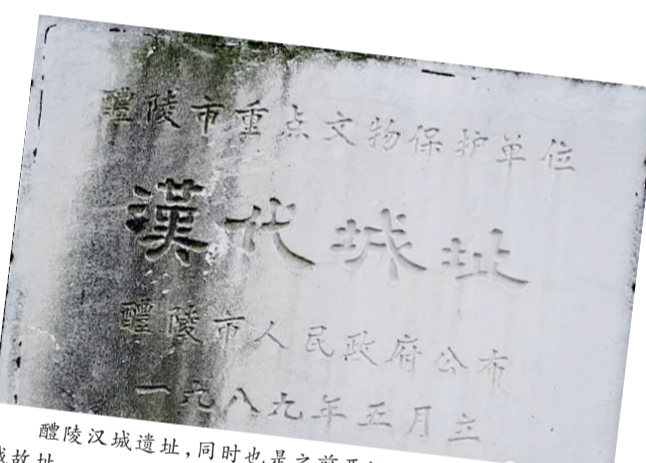
也怪不得“醴”是个旧体字。醴陵就是从远古时代走来的。醴陵置县在东汉,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了,这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,都该称文明古国中的“文明古邑”了。但县志上说:“醴陵之名,实自秦始”,那是公元前220年。但这还不是醴陵历史的起始时间。1975年2月,仙霞岭农民张立林,于狮形山半腰挖土植树时发现一商代王室象尊。象尊青铜制,通高228厘米,宽144厘米,长26.5厘米,重2775克,呈碧绿色,属国家一级文物,现存



1975年,在醴陵仙霞乡狮形岭出土的商代青铜象尊,是国家一级文物,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



醴陵八景之一的醴泉浸月所在



醴陵汉城遗址,同时也是之前西汉所封的“醴陵侯”的侯城故址



漫话“乌程”

有专家认为,探讨醴陵县名的由来,必须从古代的疆域谈起。其中有一说:汉魏六朝时,江西境内的杨岐山、安陵山、翁陵山、灞山,实为酒水发源地,属醴陵的东境。据此,则今天萍乡杨岐山一带,在汉魏六朝时,都属醴陵县境,甚至距今萍乡市东四十里的泸溪镇,也曾是醴陵的地域,有过驻军。萍乡市有个湘东镇。湘东,不就是湖南的东部门么?

现在再去讨论封疆问题已无多大意义,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提醒:考察醴陵历史文化绝不能局限于现在的行政区划范围,应该到古时的疆域中去寻觅醴陵的历史文化轨迹。

为什么光提县城以东的疆域,而不去查考西南北境呢?因为东境有一个重要的物产与“醴”字有关,那便是“酒”。

在中国古代,曾经有一种名酒叫“乌程”,有“国酒”之美称。唐代大诗人李贺有诗曰:“尊有乌程酒,劝君千万寿,东方日不破,天光无老时。”《荆川记》载:“乌程乡有酒极其甘美。”乌程本以名乡,继以名酒。《文选·七命》:“乃有荆南乌程,豫北竹叶。”可见当时乌程酒是与北方的竹叶青齐名的。乌程又在哪儿呢?《荆川记》又载:“禄水出豫章康乐县,其间乌程县,有井。官取水为酒,与湘东醴酒常年献之。”所谓“其间乌程县”,实是以县字为乡字之误,而古时的乌程乡,就是今萍乡市东“老挂城”。萍乡方言,鸭溪作注,就是古乌程故地。由此推测,古代的乌程名酒,即出自醴陵的乌程乡(《水经注》称安城乡)。而且,乌程酒因其风行全国甚久,在晋代仍为贡品。到唐代,大诗人李白曾经听说有乌程酒好喝,不远千里而往,开怀畅饮,旁若无人。《全唐诗》里,羊士谔

《忆江南旧游二首》有诗曰:曲水三春弄彩毫,樟亭八月又观涛。金粟几醉乌程酒,鹤发闲吟忆蟹螯。

《全唐诗》里还有一位诗人叫罗隐者也有诗赞曰:“一瓶犹是乌程酒,须对霜风度沓然。”就是到了今天,还有人在提起乌程酒,我在网络上还发现一首《钗头凤》词:

火石榴,乌程酒,菘城冷雨梦中休。听几片,残花飞,风随万里,遗红难碾。醉,醉,醉。心自秋,泪空流,不见梁燕人消瘦。子规啼,唤春归,断肠情绪,化为清悲。碎,碎,碎。

可见,“酒为诗客魂”,诗酒相悦,是诗人的一种风度和境界。

经过千百年的历史考验,乌程酒已非一般的白酒,它已成为一个品牌,一种文化,这种文化广泛渗透在醴陵民间。曾经有一说,叫“无酒不成席”。说的无论做红喜事还是白喜事,没有酒就办不成。还有民间流行的猜酒令,是饮者酒胆与酒量的比试,在比试中方见人的品性。所谓“酒壮英雄胆”,是一种英雄本色。“酒醉聪明汉”则是“醴陵鬼子”聪明的自嘲。那些饮酒者往往以聪明者自居。不喝个“一醉方休”,不喝到“对影成三人”的状态,就不是条好汉。所以酒文化也是一种“醉”文化。醉意才是一种境界。“是现实世界的打破与重组,是裸露的梦,是赤条条的灵魂。”

醴陵为古代产酒之地,恰与“醴”字天作之合。《仪礼》郑玄注:“醴,稻米酒也。”况且醴陵还有甘甜的“醴泉”。所谓“酒因泉生,泉以酒益贵”。自古泉乃酿酒之魂,无泉无以成酒,无好泉则无好酒。醴陵算是天设地造了。尽管我们暂不做醴陵因酒名县的定论,但醴与酒与泉的渊源关系是不言而喻的。